

我经历的电视新闻“直播”

曹景行

九月二十三日秋分，咱们中国农民第一个“丰收节”，早上六点多我就出门去上海电视台。中午我在微信朋友圈里说：“好久没做连续两个半小时的直播，只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好看又好玩。有观众留言问东西哪儿可买到，是给我们点赞哪！”

这两个半小时挺过瘾，在我看来直播就应该这样。早上到了化妆间见到何婕，才知道就我们两人进演播厅，她主持，我评论。原定两小时，因为各地提供的片子内容丰富，加上记者现场连线，临时决定增加半个小时，《东方卫视》八点半开始直播。

或许因为我早年当过知青干过农活，这些年做新闻评论时对“三农”新闻一直很关注，有机会不时去乡下看看、听听，还多次参加央视农业频道的节目。何婕与我是浙江兰溪同乡，在农村长大。直播中我们聊起乡村的话题，一下就兴奋起来，原来拟定了四段穿插交谈时间，最后增加到了八九段，加上最后的收尾总结，内容都相当实在。

我一直认为直播是电视新闻的“最高境界”，主要就在现场的不可控。那种事前把每分每秒都安排得死死的，还要层层审阅，到时只是照着本子“上演”，其实算不上新闻直播。即使像这次“丰收节”直播准备算是充足，到时还是需要应变各种状况。

评论在直播中起了时间的“松紧带”作用，随时可以填补空档，衔接上下环节。评论也必须根据直播内容的推进和新的变动，及时提出相应的观点和信息，起到丰富和深化之效，有时更可画龙点睛。如何临场发挥，就看评论员平日的功底了。

这次直播对我还有特殊意义。今年正是我做电视新闻节目二十年，也是直播新闻评论二十年。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我当总编的香港中天新闻频道做了通宵独家直播报道。但我自己从幕后转到台前，还是进了凤凰卫视之后。当时的凤凰卫视初创未久，一切都可以尝试，做人家的没做过或不敢做的事情，包括即时新闻评论。最早一次是1998年3月北京“两会”报道，那时我连聘用合同还没签，就被

推进演播室做评论，穿插在“两会”新闻特别节目中，每晚五分钟直播。

这种做法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对于电视新闻来说也可能是第一次。背后的原因还是资源实在贫乏，增加我的五分钟“口水”，或许让我们的“两会”专题显得不那么单薄吧。题目我自己定，说什么也自己考虑，没有任何限制当然也没人帮你。好在我在平面媒体上写了十来年的新闻评论，就看如何用声音来表达。我不怎么怕镜头，就是对灯光眨眼多了，内心还是有点紧张。

那年夏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访问中国期间，我们先后做了八次直播，也第一次有意识地安排我同主持人一起“撑”场面，第一次感受到现场评论成了很有用的“松紧带”。像克林顿专机飞抵咸阳机场，停机坪前欢迎仪式准备就绪，但机门久久没有打开。如果真是杨澜或陈鲁豫一人独白，很难维持太久。现在可以两人对谈，多聊聊他们到访的背景，美中可能触及的话题……直播气氛就好许多，内容也丰富许多。

最后一场直播克林顿到香港开的记者会，美方把香港本地记者和内地记者都安排在边缘位置，而且不给一次提问机会。结束时我对美方目中无人的做法给予评论：“克林顿的这场记者会好像是在白宫举行的，而不是在香港！”

当晚焦晃老师从上海传来一句话：“你应该就这样保持自己的语言风格。”太高兴了，这是我上电视后第一次得到观众的肯定。而且他上一次见到我时我能才十岁出头，他居然还能认出、还能记得。

后来，新闻直播加评论成为我们

的常规，尤其遇到重大突发新闻事件。1999年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2000年的台湾选举、2001年的南海中美撞机事件和美国“9·11事件”，接着就是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我们还发现，直播不仅对新闻事件最快做出反应，而且还能够大幅度降低运营成本。由此又萌发出新的节目形态即新闻评论，其重要性和盈利能力很快就超过新闻节目本身。随时准备直播成为我们的职业习惯。像“9·11事件”发生时我已下班回家，听到最初的报道马上打车返回电视台，一路打电话了解最新情况。其他同事不用通知也都赶了回来，有的主持人穿着汗衫短裤就坐上主播台。说直播是做电视新闻的“最高境界”，就是这个意思，如此经历人生能有几回！

时间最长的直播要数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成功那次。报道的主场本来安排在莫斯科，因故临时转回香港，留守总部的我们只能仓促上阵，两组人员轮流，从早到晚坚持了十二个小时，第二天晚上又直播了六个小时的专题。我同陈晓楠一组，发现直播开始前她就不吃不喝，直播中也不上洗手间。她说吃了东西上节目会妨碍思路，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看、听和讲上面，难怪被同事诤称“铁打的”。

直播也会有有趣的小插曲。北京申奥成功，全国欢腾，我们直播也在相互拥抱中结束。后来有观众特地问我：“电视上看见吴小莉对你张开双臂，你却转过身去，为什么？”不为什么，我转身去取放在脚下的酒瓶；怕台里没有准备，我早上带了一瓶两公升装的澳洲红酒，那时派上用场了。

新闻直播最痛心的记忆，一定是大灾大难、战火腾起时同前方记者连线对话，结束时除了叮嘱他们注意自身安全，会感到自己帮不上一丁点忙，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悲伤。再有就是直播中出了无法弥补的差错。记得十多年前曾有几位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被极端势力绑架，下午突然收到外电报道说巴军方开始武力解救人质，而且已经救出一位。

我们立即开始直播，导播接上了那位工程师山东家中的电话，主持人把外电所讲的告诉了他的父亲，老人当然十分高兴激动，连连表示感谢祖国。但没过多久又有更新的消息，那位工程师实际上已中枪死亡。直播结束后，年轻的的女主持人为此痛哭不已，尽管很难说是她的责任。

最近十年，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也加入了评论，包括直播。在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特邀评论员那三年中，印象最深的是两次大直播：2009年的国庆节阅兵和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的全国哀悼。哀悼日那天全国停止娱乐，所有广播频率都并机直播，我们的声音覆盖了神州大地每一个角落。

未来新闻直播又将如何？我期待5G时代带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刺激，电视新闻频道甚至平面媒体都可能转变为内容极为丰富、成本大为降低的新闻直播平台。有才华的新闻工作者，不论记者还是评论员，不论年轻的还是资深的，不论原来是传统媒体的还是新媒体的，不论原来是电视台、电台的还是报纸杂志的，都将到新闻现场拿着手机做直播。那一定是未来整个新闻事业的“最高境界”，今天已隐约能见雏形。



渔归
(套色木刻)
陈波

笔会

渔归
(套色木刻)
陈波

平生喜欢钓鱼，每有机会，便不免技痒，总要试试身手，从国内钓到国外。

第一次国外垂钓，是在澳大利亚悉尼幽静的山涧，记得是钓虹鳟鱼(trout)。山水清澈见底，看得见鱼在游动，一条条姿态各异。有的急匆匆，逆流而上，仿佛有什么要紧的事儿等着去做；有的慢悠悠在浅水处觅食；也有的隐藏在树根底下的深坑里，纹丝不动，活像一尊雕塑。听说虹鳟鱼胆小，受不得半点惊吓，于是便躲在岸边树丛中下钩。没想到那种鱼吃货很凶，似乎与传言给人的印象大异，钩饵一入水，便猛扑上来，一提竿就是一条。眨眼之间，三条已经上手，正愁来鱼速度太快时，在不远处采摘草莓的妻子，因为一时找不到我，忽然放开喉咙大叫了一声，叫声在寂静的山坳里回响，未及在半空中消散，水下的鳟鱼已逃得无影无踪。此后，不管我怎么换地方，怎么用钩饵逗引，怎么耐心地静候，鱼再也不来吃饵。虹鳟鱼之胆小，总算见识了。

后来去美国，发现在那里钓鱼，大家都遵守规矩。一次在费城的一条小河钓虹鳟鱼，才下钩不久，就看见对面一位素不相识的美国垂钓者向我打招呼，问我不要鱼。原来按规定这条河只允许钓五条，而他已够数，除非钓友要去几条，否则就得收竿走人。但我一来刚到，二来钓鱼主要为“钓”，而不为“鱼”，因此婉转谢绝了他的好意。当时，并无他人在场，我也不知道他已钓了五条，但见他二话不说，收拾渔具回家了。不久我便知道，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美国各地还对鱼获大小作了严格规定，不同鱼种，规格不一。普通的鱼，即使不太大，

域外垂钓记趣

黄源深

也可以拿走；尊贵鱼种，限制就严了：要那鱼长得相当大了，才够捕获标准——鱼宝宝是要保护的。于是，无论何处，钓上的鱼若不够尺寸，垂钓者都会自动放回；偶尔没有把握，还会拿出标尺量一下，即便差半个指甲的长度，也都毫不犹豫地放回。其间无人监督，无人知晓，全凭各人自觉。

当年马克·吐温笔下的密西西比河，船只穿梭，游人如织，码头工哼着号子装卸货物，到处一片喧嚣。如今这繁忙的场景，已不得见。那次我下钩的地方，据说是密西西比河最宽的河段。但见河水静静流淌，远山苍翠如洗，大河显得格外美丽。可是，仿佛大海捞针，不知道鱼在何处。一次次满怀期待地将鱼线抛入河中，一次次失望地摇着转轮拉上来，回回都是空的。记不清已经扔出第几百次了，只觉得信心在流逝的时光中渐渐消失，倦意从手臂漫上有些沉重的脑袋。正当打退堂鼓时，手中突有顿感，便下意识往上一拽，只觉得水下沉甸甸的，于是赶紧小心起竿，费力地将鱼拉出水面，好家伙！是一条 snapper (红鲷鱼)，高品质好鱼，足有两斤多重，一时兴奋无比，忘记了吃饭，也忘了疲倦，兴致勃勃地继续挥竿，丝毫没有歇息的念头。

在迈阿密泊岸，安排了多项船外活动。我选择了加勒比海海钓。刚上钓鱼船，便见一男子来收“参赛费”。原来有人牵头，发起了一个比赛，为增加点刺激，搞有奖钓鱼，每人交五美金，全船二十多人，自筹奖金一百多元，谁钓得最多，就归谁所有。垂钓者多为邮轮上的游客。参赛者中有人有备而来，志在必得。有个五十多岁的男子给人印象尤深。他自带全套渔具，满满一箱子，有形状各异的渔钩、粗细不一的渔线、五颜六色的人工钓饵，此外还备了两根精致的渔竿，一身专业钓鱼装，十足的“老法师”范儿。他和成年的儿子，各执一竿下钩，获胜几率，增加了一倍。下午四点，比赛结束，一年轻女子钓到的鱼比谁都多，获得冠军，奖金归她所有。“老法师”和儿子，一鱼未得。我问“冠军”，“平时常钓鱼吗？”她笑着回答：“从来没钓过，这才第一次。”可见钓鱼的成败，有时还真只是运气。

百慕大，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个神秘而可怕的地方，始终与飞机突然失踪，船只无故倾覆相提并论，令人谈之色变。为此，女儿提出乘邮轮上百慕大时，我不免生出些许无端的忧虑。不过为好奇心所驱，还是决定去看看这个充满传说的地方。及至到了那里，才发现那片海域，和别处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离岸不远的 underwater，隐藏着无数礁石。“早年，水手们一见到海岸，便欣喜万分，放松了警惕，不少船只因因此触礁，也给百慕大增添了浓郁的神秘色彩”，渔船船长如是说。也不知这话是否可靠，但见平淡无奇的现实与惊心动魄的传说，相去甚远，一时倒让我有些失望了。女儿和我在风平浪静的海岸附近，钓了一上午的鱼，一共收获十多条。船家说，他曾在岸边一家饭店做过帮厨，与老板相熟，可以为我们联系，送鱼去加工，就地享用，图个新鲜。于是，船一靠岸，我们便带上一条精选的好鱼，直奔饭店。落座没多久，一盘香喷喷的鱼上桌了，父女俩就着冰镇啤酒，享受了难得的美味，愉悦之情溢于言表，引来邻桌两个老美的羡慕，他们说明天也一定要去试试海钓。



离上一次去阿姆斯特丹已近两年了。两年中，总时不时地会莫名想起在阿市市中心水坝教堂的一次出乎意料的遭遇。

这与本来似乎完全不能联系在一起的一物一人——一座宗教建筑与一个电影明星——相关。那座宗教建筑，就是水坝教堂本身；那个人，则是玛丽莲·梦露(1926-1962)。

生命短暂的梦露应该从未到过荷兰，也与佛兰德文化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而水坝教堂乃是荷兰首都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与荷兰国教紧密相关。这二者能有什么关联呢？

那是2016年冬的一个黄昏，当我和友人从附近的荷兰王宫里走出来，水坝教堂几乎就要到关门的时间。带着一点侥幸，我们推了推侧门。没想到，门却还开着。更没想到的是，在教堂最显著的位置，在一般镶嵌玻璃花窗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张有好几个人高的巨幅相片。

我们几乎有点不敢相信，但那确确实实就是玛丽莲·梦露的相片。

是那幅也许最著名的、用双手护住白色无袖连衣裙的画像。性感、带有几分自我陶醉，同时又难以掩饰漂亮脸庞上若隐若现的忧伤。真的是梦露！赤裸的双脚下两只高跟鞋似乎使她失去了重心，而花窗中央十字架形状的窗棂，则巧妙地保持了整个画面的平衡。这格外显眼的十字架，使人有一种梦露被“钉”在那里接受刑罚的联想，也更让人真实地感受到这是在教堂，而不是在任何世俗的地方。

与这张巨幅相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它的下方，在地面上，有另一尊梦露的雕像。这另一个梦露，圣洁、美丽，微微低垂着头若有所思。身着一袭白色的褶地长裙，这个美丽的女人，如希腊神话中的女神那样高贵。而她脚下躺着的七个男性身体的白色塑像，则又使我们回到了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世界(见上图)。

询问教堂里即将过来关门的工作人员，才知道，原来在这里——这个阿姆斯特丹最主要的教堂，甚至是荷兰最主要的教堂，正在举行一个纪念玛丽莲·梦露九十诞辰的展览。这个展览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并且要到次年的春天才会告一段落。

展览非常细致而系统地介绍了梦露的生命故事，展示了她的大量遗物。从她穿过的香奈儿服装，到她的便条、账单以及使用过的咖啡杯，直到她铭刻在加利福尼亚豪宅台阶上的拉丁文铭文“cursum perficio (我的旅程到此结束)”，应有尽有。

而策展人之所以要在教堂里而不是在任何一个美术馆或展览馆，以如此特别而隆重的方式安排这个梦露生平大展，似乎并不是一个偶然选择。这从展览中的一段介绍文字，也许多少可以看出：

玛丽莲·梦露生前乃是传奇性人物，

阿姆斯特丹的梦露

张辉

死后声名更甚。她的名声里有神话性的部分。其演艺才能日益赢得赞赏，而她永恒的美丽，则使她成为时至今日依然是时尚和风格的偶像符号。她成功地通过奋斗到达事业顶峰，使她在男权主宰的1950年代，成为妇女解放的先锋。梦露是20世纪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至今依然；对许多人而言，她是光芒四射的典范。

策展人对梦露的高度肯定，特别是对她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先锋的肯定，还具体体现在整个展览所集中显示的梦露语录上。事实上，这些穿插在展览中的语录牌，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梦露的语言所具有的挑战性，以及她的典型的现代逻辑——或反逻辑。她当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者，但至少对策展人来说，她以自己的行动，甚至以自己的死亡，实践了她的现代生活“哲学”或生命主张。她既非“尤物”，也非“祸水”，而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现代人。叛逆而又无助，独立而仍迷惘。不妨把她的那些语录抄在这里：

我有太多的幻想，使我无法成为家庭主妇。

如果我服从所有的规则，那我就哪里也去不了。

我在床上穿什么？当然是香奈儿NO.5。

我为了成功而活着，而不是为了取悦你或任何人。

当我独处时，我修复我自己。

恐惧是愚蠢的，后悔也是如此。

回过头来看，我猜我过去一直在表演。

对我来说，曾经发生过的最奇妙的事情，就是我是个女人。

我并不想在渐渐变老时做整容手术，我要忠实于我自己的脸。

现在回想起来，2016冬天在阿姆斯特丹水坝教堂里逗留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短暂的。但我一直记得，从教堂走出来的时候，友人和我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我们其实都感到了以梦露来作为女性解放的代表，所具有的反讽意味，乃至灵魂深处的寒意。

尽管我们都知道，在教堂进行世俗性的展览，对现在的欧洲而言，已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但直到今天，我却还是对这个特别的“梦露展”的意义，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

友人曾说，在有“自由之都”之称的阿姆斯特丹举办这样的展览，并不值得诧异。因为在现代的、自由的逻辑中，一切皆有可能，甚至颠倒乃至无视神圣，也是一种可能。但我却倾向于认为，这个展览有某种象征或隐喻成分。至少它促使我们思考：梦露们所集中代表的世俗生活样态，是不是一种新的类宗教形式？是对传统价值形式的有效翻转，却也喻示着一种悲剧性的人生选择？

这，也许就是我对两年前的那个偶然的经历久久不能释怀的原由？

初稿于2016年12月18日
再改于2018年8月31日

